

乱世君子

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

陈海红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乱世君子

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

陈海红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君子: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陈海红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162-0171-8

I. ①乱… II. ①陈… III. ①张履祥(1611~1674)
—评传 IV. ①B2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469 号

图书出品人:肖启明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庞从容 唐仲江
责任校对:姚丽娅

书名/乱世君子——理学大家张履祥评传

作者/陈海红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259(总编室)
传真/(010)63056975 63292520
E-mail: MZFZ@263.net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张/20 字数/363千字
版本/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171-8

定价/45.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科建设成果资助出版项目

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目 录

引 言	1
明清之际 时代背景	1
理学演变 学术潮流	14
累世清贫 家故迭作	21
勤于书札 思有所成	26
笃信程朱 严守道统的理学人物	34
术卫世道 为学进路	34
东林君子 得节失禅	45
儒释之辨 华夷之争	50
问学宗周 终生尊之	64
辨难陈确 大学非伪	74
王陆皆禅 驳心即理	83
居敬穷理 归宗程朱	95
格物择善 切用为功的道学思想	102
格物明善 观物之理	102
人心自足 由用见体	110
存乎未发 践于庸行	117
立大直内 求其放心	123
复重于克 理以明敬	131
贤愚自为 涵养由己	140
五经为本 史为枝叶的学术观念	151
经为大本 史以验经	152
古今一事 借古喻今	161

易道切用 迁善改过	173
文以载道 诗以传情	182
力行实践 教化乡土的平民学人	191
稼穡治水 续补农书	193
教以导良 训子成人	201
于师传道 为友责善	211
礼以淑风 兵以立国	221
俯仰泰然 不愧不忤的乱世君子	235
乱世自任 于难磨砺	235
名传乡里 居世不傲	241
身藏民间 悲天悯农	249
明民清人 乱世君子	256
辨王析朱 立旧面新的思想定位	267
朱学理学 勾勒道统	269
理学清学 官学正统	279
心学理学 明清浙学	291
术随俗变 人与时行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2

引言

张履祥曾说：“论人者必考其世，而为学者先识其时。”我们将遵循先儒之言，从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出发，以考世道之艰难，以明学术之变革，以体人生之坎坷。

明清之际 时代背景

1644年李自成起义大军攻破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自缢于景山。同年清王朝统治者福临进驻北京，自称代明而承大统，“号曰大清”。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少数民族夺取了华夏大鼎，其后以统一的学统与政统双重身份定都北京。对于华夏文化传统而言，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象征内涵。汉族知识分子所延传的文化传统是以汉族政权为依附主体的，儒家学术虽然有以文化作为判定文明高低而不以民族作为人生归属的思想，但是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的说法，还是塑造了历代汉族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文化优越也罢，忠君也罢，都现实地左右着儒家知识分子的从仕选择。元代统治中国造成的文化压制与社会对立，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在汉族知识分子与明遗民心中引起的波澜，绝不是短短几十年可以平静下来的。而且，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民众心理的影响，更是需要时间来调整、适应与选择。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浙江嘉兴桐乡清风里人（学者以其所居杨园村而称之为“杨园先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换的时代。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酝酿着深层的变革。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从道统的角度来对社会展开批判与反思。显然，融道统与学统于一体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古代学

^① 这一说法有两种解释：一说，夷狄即使有国君，也不如诸夏没有国君。另一说，夷狄尚且有国君，不像诸夏却僭越作乱，反而没有君臣上下之分。前一说强调了夷狄之不如诸夏，后一说则是强调尊君的思想。参见钱逊：《〈论语〉读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页。

术最为难得的思想独立与成熟。我们可以说正是明代社会内部固有的长期的矛盾,才造成了明清的易代;但是,明清易代的政治变故,更直接、更迫切地要求社会进行反思。具有道统意识的学者,正是首先在体会家破国亡的痛苦中来面对明清之际的时代主题的。

鼎之革,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象征着天地易位的重大灾难。处于朝代颠覆中的张履祥说:“目前是何等时势,处夷狄患难之时。”他在《吊李石友书》中又说:

先是一载,燕京沦没,兄寓书予曰:“骇变非常,痛心疾首。吾辈豪管腐儒,虽生负血性,无力杀贼以报明主,宵旦思之,或号或泣。”然则兄之死也,固其志之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皇以求义,又无惑也。可谓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死,历生之艰难,处白日如永夜,闻鸡犬如豺虎,未尝不叹兄死之乐。^①

这是明遗民的本能反应,体现了一个国家固有的向心力与精神归属。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明遗民都能如此。他说:

君父大故,吾党伏处草茅,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痛悼而已。独怪京师之大,天下人之众,其间更无一人为主杀贼,使其猖獗至此。至于稽首贼廷,称臣劝进者,皆平日立名声,取高官之辈。^②

皇帝遭不测,平日立名声、取高官之辈谈何尽忠?只不过曲颜献媚投降称臣。原来,“世衰道废,谋身谋家,俱以利不以义。”^③“今日寇盗满域中,大江以北,涂炭已甚,东南又事作矣。”^④京师无人杀贼,江北一败再败,东南战事又起,但这又能怎样?

北都之变,先皇帝、先皇后殉社稷。天崩地坼,流闻江南,匹夫孺子,莫不震惊恸哭。上下官司,理狱讼,急征输,若为弗闻也者。虽有闻知,谗曰:“哀诏未至,真伪未可信。”相视无发丧者。……两浙缙绅

① 《吊李石友书》,《杨园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40页。以下凡引自《杨园先生全集》,只注篇名及页码。

② 《答吴又韩·甲申》,第363—364页。

③ 《答吴仲木·六》,第50页。

④ 《与岑汉明·壬午》,第256页。

大臣在家者，俱至杭州会哭。议出师，而巡抚、布政司竟以饷匱为言，无一旅出者。^①

崇祯死于北京，而江浙官府竟不发丧且不出兵抗击，由此可见明朝官僚机构后期的分崩离析，社会离心之势日胜一日。江河日下，败象横生。纵有崇祯中兴气象有忠如刘宗周一般孤臣，孝如张履祥一般平民，大明江山想其不败不亡也是不可能了。

如何处明室崩溃之困？其友徐文匠说：“忽闻天崩地裂之惨，涕流数日，谁非臣子，岂有转颜事人之理？惟有渔樵之乐，人品文章无踰此矣。”张履祥对此的态度是：

弟乡人耳，何足以言？但今干戈伊始，□□终无两立之势，大贤之士，方当僇力中原，克复旧物，樵山渔水又未为今日事耳。弟间观易象，方此神州离析，宗社播惊，在坤之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窃以吾人草茅，大概在坤之六四，“天地闭，贤人隐”，“无咎无誉”，可以免患。或者声名不可太高，交游不可太广，进取不可太锐，亦藏器待时，俭德避难之义也。^②

作为遗民，徐文匠决定不事二朝，他要作渔樵之乐；张履祥则认为，自己非大贤之士，要以草茅之士藏身守器来躲避世难。显然，变故之下的平民之士也不能够提供太多的有效之策。

国变卒作，天地崩坠，中兴事业，佐理无闻。将来之乱，恐未有已。制科之事，朝廷一遵旧章，间有言及孝弟、力田、奇材、异等者，亦未必举行，即行亦不过开一幸门。当世贤士，终不能由是以进也。吾党所事，舍制艺亦无他务。但处今之世，自非实学、实才不足以济。今日诸生，则思进士做，若果登进士，执何具以往？岂能如昔日坐享太平，优游贵乐乎？徒有身败名陨，为人笑辱而已。弟意欲于海滨僻壤，挈妻子而居，为苟全性命之计。因于此修身力学，以俟天命人事之可为，则虽一命之膺，庶几得如古人所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然躬耕负薪，亦足以没齿而无愧。^③

① 《言行见闻录一》，第885—886页。

② 《答徐文匠·甲申五月》，第262页。

③ 《答吴文生》，第263—264页。

南明小朝廷,并没有引起张履祥太高的激情。我们不知是因为张履祥有见于偏安政权的复兴无望,还是因为他已经看破举业之途不再走制艺之路,或者是乱世之相使不再有任何进取之心只一味遁世于乡壤僻土。当然,在以后的人生历练与道学浸融之下,他更深地体会到儒家君子人格的现实意义。总之,现在他是要一意耕田读书了。

分崩离析的官僚机构,首先应该来源于庞大的士人群体的精神出了问题。一个社会承平之日,还不能看出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社会精神对于维系政权的意义;但是当社会崩溃之后才认识到时,却又只能作事后的悲叹。可惜的是,新一个兴替轮回再次开始,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宿命。传统中国社会,能够塑造社会精神生活并且具有标杆作用的,只能是士人。在对明代社会崩溃、政权沦落的反思之中,思想家们一致认为明末的士人清谈是引起社会变乱的最根本原因。作为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清初三大学问家之一的顾炎武认为: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之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反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其言!①

这就谴责了明代心性清谈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论这一认识是否真的符合历史事实,但是知识分子对于士风重要性的关注,是有其意义的。张履祥也屡屡提及世道艰难,学术凋敝。他说:

方今世教崩夷,正气淹没,高志之士扶植一人二人亦是难得,不特成人之美义理当然,要亦天地之心必出于此。乡党之中,见闻所及,非无才辨声誉自命过人,考其立身本末,终不免羊质虎皮之目。②

这是从社会最基层的视角,来看明代末期社会风气的败坏。而这一社会风

① 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周苏平、陈国庆点校,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② 《与凌渝安·七》,第180页。

气,又与士风相互关联。他说:“士人胜衣冠,即无不广交游,谈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笔舌甚于戈矛,亲戚同于水火。”^①

万历、天启而降,士风浮竞。至崇祯,人心学术之坏,东南日甚。其以文社鼓煽,虽穷乡邃谷无不至者,号曰“声气”。一时声名之高,众所奔走者,江西举人艾南英,南直解元杨廷枢,翰林张溥、吴伟业、周钟,生员周立勋、孙淳。其相继而起,则兵科陈子龙、吏部夏允彝、举人徐孚远。浙西进士吴昌时、举人朱一是、贡生范驥、陆圻,又其著也。其后或以罪被诛,或无后以死,鲜不祸及其身。虽有节义自砥,宅心平易,难可概论。而克全无几,岂亦逢天倖怒,理有固然者欤?^②

这就既描写了东南社事的纷乱情形,又直指这一风气给士人本身所带来的无穷祸害。他感叹说:

① 清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论明末结社,盛书其事。“东林书院复于万历甲辰,首善书院建于天启初。天下书院毁于天启乙丑,而复社遂起于崇祯辛未会试之后。先是应社始于甲子,吴郡、金沙、娄东、釐李十一人,杨彝(子常)、顾梦麟(倩士)主《诗》,杨廷枢(维斗)、钱楠(彦林)主《书》,周铨(简臣)、周钟(介生)主《春秋》,张采(来章)、王启荣(惠常)主《礼》,张溥(天如)、朱隗(云子)主《易》。孙淳(孟朴)嘉兴生员,但为奔走四方,征五经文字之人,是曰应社后十子。所选刻有《复社国表》一集至四集。当其始取友尚隘,来章、彦林谋推大之迄于四海,于是有广应社,贵池刘诚(伯宗)、吴应箕(次尾)、泾县万应隆(道吉)、芜湖沈仕柱(昆铜)、宣城沈寿民(眉生)咸来会。声气之孚,自应社始也。崇祯初,嘉鱼熊开元(鱼山)宰吴江,进诸生讲艺。于是孟朴里居,结吴(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同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社、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金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书曰:‘学不殖将落,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厥长,毋以辨言乱政,毋于进丧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谏,大用摈。金曰诺。孟朴历淮酒以达于京师,贤士大夫必慎择而后矜奖。盖先后大会者三,复社之名动朝野,孟朴劳居多,而敛怨深矣。正月,吴民陆文声(《明史》作太仓监生陆文声)呈称风俗之弊,原于士子。庶吉士张溥知临川县事,张采倡立复社,以乱天下。思陵下提学御史倪元珙察核。倪言:‘诸生诵孔子,引其徒谈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实非树党。陆以私憾妄讦,邪臣以公蒙塞。’降光禄寺录事。苏州推官周之夔,溥同年进士,初入社,至是希阁臣意,墨经诣阙,奏溥等树党。案久未结。复有草檄以声复社十罪者,略云:派则娄东、吴下、云间,学则天如、维斗、卧子。上握国柄,下乱民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关五鬼。外乎党者,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屈、宋不足言文章。或称学究智囊,或号行舟太保。传檄则星驰电发,宴会则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金岫、给事姜埰疏白其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复社一案准注销。后福藩制,阮大铖怨戊寅秋南国诸生顾杲等百四十人之具防乱公揭也,日思报复。爰有王实鼎东南利孔久埋复社渠魁聚敛一疏,阮语马士英曰:‘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至欲陈兵于江,以为防御。心知无是事,而欲尽杀复社之主盟者。时沈昆铜、陈定生辈皆已就逮,桐城钱秉鐙、宣城沈寿民亡命得脱,假令我大兵下江南稍缓须臾,则南省士类难乎免于白马之祸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明末结社》,《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477—478页。)

② 《近鉴》,第1036页。

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十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祸乱已极，一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乃踵其失而加甚焉。《诗》所谓“载胥及溺”、“沦胥以亡”者也。^①

士风败坏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政事、官德、人心、风俗，无不因之而败坏。即使有人想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难以成功，甚至会有推波助澜之弊。他追溯历史：

本朝至隆、万以后，阳明之学滋敝，而人心陷溺极矣。卑者冥冥于富贵利达，既惟流俗之归，而其高者率盍于李贽、袁黄猖狂无忌之说，学术于是乎大裂。东林诸君子，救之以紫阳之学，卒不能大正于天下，则以胥溺之久，未可以岁月变。而一时学者，又或不免于抱薪之拯，是以卒与天下相寻于祸败。而天启、崇祯之间，缙绅之贤者，犹能以名节自爱，则亦莫非倡学之功也。^②

阳明倡导于前，李、袁推波于后，天下学术随之混乱。张履祥肯定了东林学人希望拯救这一混乱局面的主观努力，但最终也只能是促使一部分贤士能够砥砺名节罢了。而且，张履祥这里也批评东林学人逞一时之意气，加剧了天下思想分裂的局面。

在这种风气之下，张履祥自己也曾参与过社事。只不过在诤友的严厉批评之下，最终从中摆脱出来，并一意谴责交游之风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性、灾难性后果。

近代盛交游，江南益甚，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顾士风独恶之，未尝与，每谓予曰：“古称百里一士，千里一贤。谓彼皆贤士，何贤士之多？如非贤士，敝俗伤教，莫此为甚。胡入为？”因赋贫交诗示予。予尝赴硖石山社，不满。予又赴语水社，甚愠，几见绝。后知为李石友、钱一士、董若雨所强，方解。先是周钟来教吾邑，士友如云。又张天如开门受徒。天如名甚著，会元吴骏公为其高第弟子，而

① 《纪交赠计需亭·癸丑》，第490页。

② 《告先师文》，第635页。

天如亦职翰林，郡县长吏及提学较士，靡不以之为耳目。由是娄东之履日众，远近名士先后至吾邑者，踵相接也。当是时，士有不谈介生、天如者，人皆鄙之。士凰恒戒予曰：“彼皆浮伪，误苍生者必此人也！不宜为所惑。”予以故得不往见，虽友朋时或招予，予唯唯，终不敢违士凰教。今天如物故，士凰既卒，而周钟行事适验其言。然予窃意天如在，当不至若钟之裂也。^①

这里的语水社，可能指的是吕留良三兄吕愿良崇祯十一年（1638）主持成立的澄社。从此以后，张履祥只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切磋道学，不再参与其中。

士人集社，以文会友但又评论朝政。假如真的能够激励士节倒也罢了，但在现实的政治变故之中却不起任何作用，反倒是廉耻丧尽。

风俗偷薄，人心离散，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古岂有今年流寇纵横二三千，长驱入京师，而无一御之者？明年夷狄纵横二三千，长驱入京师，而无一御之者？今者祸已及南，乡里之势岌岌不保。而乐变幸乱者，始自衣冠之族；先去民望者，倡自缙绅士大夫。呜呼，可哀痛也已！是以保聚之道，一以合人心、革风俗为急。盖中国与戎狄，乱贼与贞良，仁义与不仁义而已矣。仁义则四海为一家，不仁义则父子为怨恶。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②

衣冠之族、缙绅士大夫岂不是平日高倡性命之旨的文人？一临国家危亡，退则退矣，甚至乐变乱，先投诚。显然，参加文社的学人只是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名望，或者就是学习为制艺时文的技巧，根本谈不上为家国天下着想。他说：

今之为学者寥寥矣。生于吾前，其志于斯者，百不一人。生于吾后，其志于斯者，亦百不一人。乃或有志于学，而惑溺于释、老，颇僻于己见，附影逐声，相寻而入邪慝者，盖不少也。至于学术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准于兹，孜孜矻矻，老而弥笃者，闻见所及，诚不数人。^③

世益衰，学益废，子弟之所是，父兄以为非；父兄之所崇，子弟以为过；父兄子弟皆不以为非，又或限于资之所禀，狃于习之所深。语以科

① 《言行见闻录一》，第882—883页。

② 《保聚附论》，第584页。

③ 《吊吴仁伯文》，第641页。

举之业，而信且从者十犹五六，至语以古人之所为学，而信且从者十无二三矣。^①

这就是张履祥笔下的社会风气，父兄子弟互相是非，毫无依断；而学者徒事科举，不求古圣贤之学。没有人去追求圣贤之道，也不会有人去真正践行程朱之学。因为老师刘宗周的书中多有与时无所忌讳的话语，他甚至都不敢示人，而“道学”二字则已经成为举世唾骂之资。

既然学风败坏，张履祥认为世风人情也必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在他的笔下，明末清初的社会，确实是乱相频生的时代。乡风沦胥，小人横行；盗贼夜出，兵匪日行；水利不修，仓长自肥；人情淡薄，名利成风。他有言道：

处今之世，乡党无公论，有司无正法，方是沦胥之道，否则太平盛世矣。念之可痛也。^②

今日寇盗遍天下，朋党亦遍天下；名士遍天下，饥民亦遍天下；贪官遍天下，狐狸亦遍天下。^③

我们这里再录张履祥《桐乡灾异记》一段：

甲申始乱，五月稍定。明年春，选妃，江南童男女无不婚嫁者。夏五月，郑兵逃归，过皂林，人相杀，聚众焚巨室，发坟墓，同宗兄弟行劫夺，缙绅主之。六月，贝勒入浙，经皂林，令率丞尉学博父老及举贡生员献牛酒以邑降。是年，皂林镇为墟，人烟绝，盗乃大起，连岁势益甚。东自嘉兴县嘉会都入桐乡，东西两八都，无非盗窟者。西自归安县含山界入桐乡，二十、二十三两都，蔓延至二十四、二十五诸都。日夜劫杀，焚庐舍，掠子女。良民奔匿城邑者仅免。然催科急，田业荒，衣食靡给矣。讹言选西女，民大骇，亟配合，嫠妇嫁且尽。^④

兵荒马乱，盗贼并起。妻离子散，室破屋坏。官降绅主，皇家选女。民奔邑毁，人伦尽丧。这是怎样的世道，这又是怎样的悲情！1645年，清军进入浙江。当地仕宦纷纷投降，社会终陷入新旧王朝更迭的混乱时期。张履祥所在的地

① 《祭张言雅文》，第645页。

② 《答徐敬可·十四》，第229页。

③ 《与李石友·一（壬午）》，第249页。

④ 《桐乡灾异记》，第517页。

区,也就不能不沦入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之中。在张履祥生活的几十年之间,桐乡地区屡屡水灾、干旱。一逢天灾,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粮价飞涨。生存之下,人心生变。以至于强者为盗,弱者流亡,甚至有“道殣相望,买奴婢斗米二人,夫妻、子母相离而不泣”。真正是生不比死,以夜作日;生灵涂炭,遍地孤魂。他记到:“自盗起至是,越二十年,良民死者犹千万计,盗贼死者不啻倍徙,若其流离失所,窜徙奔亡者,何可胜算?”^①

张履祥生活的乡党之中,“凌虐孤寡,毁室取子”之事也不鲜见。心坏言伪,致使波复生波,蔓益滋蔓。有诗说:“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他改为:“桃李诚二本,犹然相代僵。何况同根本,而或有相忘。”^②意味李有代桃之谊,而同根生之人却有互相背弃之时,社会真正到了人兽相近的地步。他悲叹:

吾人生于今日,正如一叶之舟漂荡乎洪流巨浪之中。^③

居今之世,真如乘漏舟以涉江湖,风波覆溺之惧日有之,亦在在为然,惟有修身守正,以俟而已。^④

“漏舟涉水,日惧波覆”,这确实是一个兵匪当道、官盗共蠹的时代。当社会的上层阶级不能够为小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只能是在漏舟中涉水,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丙申年间,张履祥自家就遭劫。

前月十八日之夜,敝里受劫,十家而九,弟亦不免。虽家无长物,所失仅十余金,然寒暑敝衣已略尽矣。幸弟在家,亟携妻子遁匿,得以身免,而书籍犹幸无恙。劫后人情益复危疑,纷纷迁徙以去。弟以贫窘,不能移步,家人旦夕惶惧,不得已与之相守,以观事势。^⑤

初以盗警,继以擒盗之兵为害复甚于盗,道路几为不通。目下盗巢移远一二十里,而骑兵又将经皂林矣。^⑥

盗方始远,而兵害又至。兵盗相继,民无宁日。正如他所说:“乱世崩离,杀

① 《桐乡灾异记》,第518页。

② 《与友人》,第267页。

③ 《与吴袁仲·三(甲午)》,第285页。

④ 《与许元龙·丙申》,第666页。

⑤ 《与吴袁仲·十一(丙申)》,第296页。

⑥ 《与吴袁仲·十二(丙申)》,第297页。

人如麻。”^①他只能发出感叹：“呜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②

他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来寻找乱世之因，“当今之乱，由于数十年以内人不知学，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不啻洪水，其所以残贼其类者，不啻猛兽，是以及此厄也。”^③当然，寻找社会变乱明室灭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军事的等，学术仅仅是其中的一项。时人有抨击朝廷用佞的，有怒斥阉党专权的，有批评社会承平的，有愤恨官饱私囊的，有谴责道学空谈的，有直斥异学乱俗的，有抨击君主专制的，不一而足。社会经此变故而人心思变，新朝廷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与价值的重建来维系异族统治的合法性。而旧君主体制下的忠臣遗民则需要经过多重思想的反思来适应社会的变革：其一，痛苦反思既定思想的失误；其二，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新生政权；其三，汉族知识分子如何改变文化上的优越心态，以接受“夷狄”的至上地位。

张履祥引当时丹阳布衣周仲纯于崇祯初年的一段话，来指出明代社会隐藏的巨大危机。周说：

今当宁皇皇所急者，财赋、兵戎，而置赤子于度外。进用之人，惟刑名簿书、甲冑干櫓之士。殿最之间，非贿赂嘱托不行。明旨之下，部文之行，但闻责郡邑以催科，未闻课闾阎之生聚；策封疆之战守，未闻恤道路之流亡。此民生所以日促，国本所以日危。《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变之后，千村万落，尽生荆棘，凶荒疾疫，必将继之。赋敛不稍宽，力役不稍息，民不堪命。吾恐外患未夷，内忧已伏，遂致割肉疗饥，肉尽身亦随毙，终有大不可言者矣。国家人才，宁独簿书、干櫓已乎？圣贤立言垂训，岂至今日真一无可信者乎？^④

明朝二百多年，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明室不得不面对的大患。明成祖迁都北京既是要削去淮右势力，也是为了抗击北方之祸。但是有明一代这一问题始终都没有处理好，一待民变，义军风云而起，少数民族政权借势而下，大明江山就不能不落入外人之手了。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生日促，国本日危，而又必须支持对外用兵。而在君权一统下内部政治势力的分权，又极大地消耗了政治本身的治国效率，民生日益穷困以致激起民变。等到崇祯帝上台时已是尾大不掉，极度虚弱的肌体已经不能支撑刺痈除脓的手术，终至于一溃而不可收拾。

① 《答姚大也·一（丙戌）》，第375页。

② 《祭钱字虎文》，第648页。

③ 《答姚大也·一（丙戌）》，第375页。

④ 《言行见闻录二》，第915页。

一个良好的肌体必须依赖不断的血液供给，而明室的百姓在文官与武备双重压力之下缺少必要的造血间隙。当内忧与外患共同施力时，积弱积虚的明室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而对于内部百姓之反，一些士大夫倒是既看到了小民食不果腹而情不得已的现实处境，也能看出民众由小民而成世贼的心理过程。海盐人彭仲谋以秦末起义为例，他说：

秦盗之发难也，二三戍卒畏捕诛亡走山谷间，饥人攘袂而攫食，马厮驿徒群噪而傅之，非有辍耕叹息，下第失职之夫，思愤鸷为天下雄也。有良吏焉，拯其凶而弭其害，蠲租而赈之，俾馁者得食，亡者得旋，即有不逞者登高疾呼，亦奚应之有哉？不此之虞，而祸乱是崇，虽有荒瘵莫之省忧，宜乎一决之不复也。然寇之发也，流戍数十为之魁，余皆荷鋤南亩者也。曳耒以为兵，裂裳以为帜，闻金鼓则怯而走，虽遇百夫之旅而莫敢斗也。掠虚集，盗牛羊，刈芻粟，虽过百雉之城而莫敢攻也。三晋断河以为防，秦师扼吭而蹙之，无孑遗矣。涓涓不窒，遂成江河，渡河而东，则糜烂蔑收矣。猎兽者纵之五达之原，不若掩置其窟者可坐得兽也。统殷、鼎臣、尚憬、玄默，咸非将帅之才，而委之以晋豫数千里之地，卒以覆军杀将，藉寇以兵，司爵者何人乎？^①

彭仲谋确实有其见识，他认为起义者非真有辍耕叹息之远志，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亡命之徒与一群乌合之众的响应者。擒凶而弭首，赈饥而散民则自无忧。再下之，良将名帅一击即溃，而不至成患。而为政者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机，终至酿成大祸。这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警告，只可惜终不成朝廷之策。张履祥深许“无术止饥，自无策弭盗”之论。他还记有崇祯年间吴秋圃的分析：

窃以一岁之饥民犹可言也。自壮者散而之四方，不复思归田里，盖既无牛种，先惧催科，长为流民，即为盗贼遍地，卖犊买刀，不可言也。自用兵以来，如用毒治病，毒发而病愈，多明效大验，亦既见矣。为今日之计，惟望庙堂猛省覆辙之非，别图治安之策。尽撤新添之兵，悉免新加之饷，罢去督师不用，嵩贵各抚道将竭力以守疆土，使寇无所掠，久将自尽。齐、豫诸处流亡多者，暂捐一二年田租以招抚之，如抽薪息火，沸乃可止。诚无变计，不知所终。所患者，公卿满朝，无一肯

^① 《言行见闻录二》，第916页。